

语文科本体论基础

Y U W E N K E B E N T I L U N J I C H U

史成明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语文学本体论基础

史成明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文科本体论基础/史成明著.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641-2638-4

I. ①语… II. ①史… III. ①语文课—教学研究—中小学 IV. ①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9688 号

语文科本体论基础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 210096

出 版 人: 江建中

网 址: <http://www.seupress.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厂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212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1-2638-4

定 价: 25.00 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读者服务部联系。电话(传真): 025-83792328

本书属江苏省博士后基金资助项目

中文摘要

针对现当代语文教学及其研究取向中本体意识的缺失,本论著旨在强调语文本体意识对于中国当代语文教学及其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试图通过对中国现当代语文本体的研究,对处于“丧魂失魄”和歧路状态的语文教学及其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首先,本研究从写作缘起切入,从现代语文教学在百年历程中的历史遭遇和当代境况切入,将语文教育的本体研究放在社会和时代的大背景之中。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本书的研究目标和试图解决的问题,即力图回答“语文是什么”、“语文教什么”、“语文怎么教”,并从教育哲学的角度考察了百年语文教学的哲学依据和本体上的遮蔽,确立了本书的研究路径、方法和研究框架。

其次,论著围绕着“语文是什么”的问题,考察了百年语文在早期把语文教学单纯当成语言教学的偏差,同时也考察了在发展过程中的把语文教学几乎等同于文学教学以及几乎等同于人文教学的偏差,最后考察了语文教学作为生活语文教学(“大语文”)的偏差,接着通过“语文缺失了什么”的讨论,归结出语文教学存在四方面的缺失:生命本位的缺失、语言本位的缺失、学科本位的缺失、教学本位的缺失,最终明确了语文教学是学科意义上的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语文教学,试图通过一系列的辩误从语文教学元教学的角度回答“语文(语文教学)是什么”的问题。

再次,本书围绕着“语文教什么”的问题,主要考察了百年语文在教学内容上的偏差和失误。首先从“语文不教什么”切入探讨了百年语文在教学内容上存在着大量的“非语文”的内容,即泛语文、伪语文、反语文;其次又从“不教学生已懂的”、“不教学生虚假的”角度继续探讨语文教学在语文教学内容上的失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语文教学教什么”的探讨,从“教学生生命”、“教学生语言”、“教学生逻辑”、“教学生基础知识”、“教学生文言素养”等角度作了一定程度的挖掘,并特别指出了在“语文教什么”上存在的两种失误:教教材或用教材教,把阅读教学作为语文教学重点。

与此同时,本书还围绕着“语文怎么教”的问题,由语文教学的可教性讨论切入,重点进行了“语文教学要不要系统”、“语文多元教学有没有界”、“语文教学是举一反三还是举三反一”、“语文教学活动追求形式还是追求实质”、“语文教学如何面向传统”等相关问题的探讨,提出了语文教学还是要追求教学的系统性和层级性,多元教学必须有底界,语文教学更多强调举一反三,语文教学必须重视传统传承等

观点,其中有些观点并不是新观点,但却容易为一味求新或追求片面或极端或苟安于现成教学模式和方法的人们所忽视。

最后,本书从百年语文教学的哲学依据切入,从不同时期的教育哲学的主流切入,分析了实用主义、国家主义、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对语文教学的影响。应该说,作这样的划分难免有武断和简单化之嫌,但一是为了论述的清楚起见,二也是为了说明语文教育在中国,和种属学科——教育一样在相对独立性方面存在太多的欠缺,而更多地为社会、时代、政治、经济等因素左右和裹挟,这同样也是语文教学在本体上存在较多遮蔽的主要原因之一。

研究认为,从本体角度考察中国语文教学的历史和现状中的成败得失,可以获得一些基本的结论: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学只有基于学校语文教学和学科语文教学的角度才有可能走向实质和本体意义的语文教学;语文教学只有在基本确认“教的是‘语文’”和“用符合语文学科规律和特点的方法或模式来教”才能走向真实、充实和有效;它山之石(西方的教育学、语言学、母语教学经验)对中国的语文教育的作用不可高估,语文教学必须基于民族和传统的立场才能走出一条自救之路……

关键词: 语文科 本体论 基础

Abstract

The study is to emphasis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ontology to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teaching and its research due to the lack of awareness of the ontology of Chinese teaching and its research. The research in the ont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an affords a salutary lesson for the Chinese teaching and its research which are on the way to a loss.

In Chapter One, firstly, why the research is done and what has happened to modern Chinese teaching during the past 100 years are introduced so that the research in the ontology of Chinese teaching can be taken in the social background. Then, the research aims and some key question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search are put forward. Those questions are: “What is Chinese?”, “What is taught for Chinese teaching?” and “How is Chinese taught?”. And in the end of the chapter,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framework are decided after discussing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for the 100-year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light of educational philosophy.

Chapter Two is focused on the questions of “What is Chinese?” and “What has been lost in Chinese teaching?” As for the first question, the chapter points out some misunderstanding views have existed on Chinese teaching of 100 years: Chinese teaching was misunderstood only as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early stage, almost as literary and humanities teaching in the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n as Chinese teaching for daily life. With regard to the second question above in the chapter, a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Chinese teaching has been lost because of its lack of life-in-self, language-in-self, subject-in-self and teaching-in-self. According to the discussion above, the chapter defines Chinese teaching is a subject teaching focused on fundamental education for schools.

The third chapter is mainly about “What is taught for Chinese teaching?”. To answer the question, Chinese teaching content during 100 years is analyzed and a large amount of teaching content characteristic of “non-Chinese” has existed which is embodied through “general-Chinese”, “semi-Chinese” and “anti-Chinese” content upon the principles of “not teaching what have been understood”

and “not teaching what is unreal”. Based on the above, the chapter gives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taught for Chinese teaching?”: “Life is taught.” “Language is taught.” “Knowledge is taught.” “Literary quality is taught.”. Also, two kinds of misunderstanding of “What is taught for Chinese teaching?” have existed: teaching textbooks or teaching with textbooks and misunderstanding reading teaching as the only goal of Chinese teaching.

Chapter Three answers the question “How is Chinese taught?” After discussing some relative question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Chinese should be taught systematically, Chinese multi-teaching should be to some extent, Chinese teaching is more inductive than deductive and Chinese teaching should connected with its tradition.

On the 100-year-Chinese teaching philosophical basis, an analysis is attached to the effect of pragmatism, nationalism, scientism and humanism on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light of mai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parties in Chinese different stages.

Meanwhile, the dissertation points out that the way of dividing main philosophical parties may be not appropriate. But it is done for a clear interpretation that Chinese education, similar to the subject of Education, is much too deficient in its relative independence. Chinese education is constrained by some factors of society, times, economy and politics, which is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many deficiencies exist in Chinese teaching ontology.

At the end of the dissertation, some conclusion are drawn as follows: Chinese teaching for fundamental education can only be meaningful if its teaching is schools and be characteristic of the subject itself. Also Chinese teaching can only be authentic, substantial and effective if it is certain “What is taught is ‘Chinese’” and “What is taught is taught in the way or through the model appropriate to the laws and features of Chinese subject itself”. Chinese teaching can draw much more 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other subjects such as pedagogy, linguistics and native language learning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Chinese teaching can only be promoted if based on its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dition.

Key words: the Chinese subject, ontology, basis

自序

中国的教室几乎天天在教语文,中国的学生几乎天天在学语文。的确,语文学科被认为是基础中的基础,在中国基础教育的序列里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然而,语文是什么?什么样的语文知识教学才有价值?什么样的语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才切实有效?什么样的语文教学评价才能够准确客观地反映语文教学现实?显然,这些都是语文课程与教学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也是语文教育研究者、工作者、学习者在研究、工作、学习之时必须追问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的语文教育在百年一直处于被批评的状态?为什么中国的学生学语文学得那么累,那么无助,那么痛恨?为什么他们经历如此艰辛的跋涉之后,却发现他们所学的却往往是低效的甚至是负效的?对于这些问题的追问有可能使我们触及语文教育的实质和价值层面。

在语文教学的研究和实践中,我们关注的往往是“教学模式、方法、技巧”层面。当然,“如何教得有效”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只满足于此类问题而不去追问“语文是什么?”、“语文教什么?”、“为什么要开设语文课?”、“语文课的本体意义和核心价值到底何在?”,那么语文教育研究者就不是真正的研究者,语文教育工作者也就往往止于“教书匠”的层面。

胡塞尔的现象学有一个最响亮的口号:回到事实本身。我们不妨这样说,要真正研究和解决中国语文教育的问题,就必须“回到语文本身”。“回到语文本身”,这既是我们研究语文教育的态度,又是研究语文教育的路径和方法。

“回到语文本身”,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语文科尽管已设立一百多年,但其课程与教学的理论根基极其薄弱,而这与中国教育百年的理论根基极其薄弱相一致。而作为最核心概念的“语文”,到目前还没有稳定的确切性定义,这就可能带来语文教育和语文教育研究的混乱,因此,语文科本体论研究必须尝试回答“语文是什么”。

“回到语文本身”,我们就会发现,太多的语文教师上课教的并不是“语文”,或者说他们的课堂并不是有效的真正的语文课堂。语文课堂首先必须像陶行知先生提倡的那样“教人求真”、“学做真人”,必须像陈鹤琴先生主张的那样让学生成为“现代中国人”,但是我们的教材中仍然充斥着太多的“伪情文”、“伪哲理文”和“伪圣化文”,我们的课堂也仍然充满着教育意图过于明显的说教,这样培养的往往是“虚假的人”(“伪人”);语文课堂其次应该有其特定的学科疆域,让学生形成一定程

度的语文素养,但是我们受传统语文“全语文”、“泛语文”的影响,教学内容往往过宽、过泛,“语文教学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这样势必使学生“杂而不精”;语文课堂应该让学生通过语文的学习去热爱生活,热爱人生,解放自己,解放他人,诗意地栖居在语文课堂和生活之中,但我们的课堂却有时让学生在扭曲、异化中形成了冷漠、仇恨,成了马尔库塞所担心的“单向度的人”,因此,语文学本体论研究也必须尝试回答“语文教什么”。

“回到语文本身”,我们就会发现,太多的语文教师陷入“语文越上越不会上”的尴尬境地。语文课不能“教教材”现在已形成共识,但语文课“用教材教”也同样面临困境,因为各个学校甚至各个教师对教材的解读和目标选择的多样化,必然会带来语文教学的不确定、不衔接、重复叠加;而如果我们一味提倡让学生自主建构和解读,同样会出现语文阅读和教学到底有没有边界的疑问;同时,如何让传统语文教学的优秀积淀和国外语文教学的优秀因子真正内化到现代语文教学,避免目前语文教学中盲目趋新的形式主义倾向,也是我们不能不研究的重要命题,因此,语文学本体论研究还必须尝试回答“语文怎么教”。

我深深地知道,我这样说,容易给人一种嫌疑:“唯我独革,唯我独尊”,这是我万万不敢也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在当初确定研究选题之后,写作过程极其艰难,常常自我纠结,屡欲停笔,很多时候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语文就是语文,无须言说,无可言说。于是,研究语文教学的困惑和尴尬也就常常在这种无可言说的状态中显示出来,或许,不可说,才是语文学本体本身。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的一些认识和判断绝不能作为定论,而且,其中对很多问题的研究如对符合汉语文教学规律和特点的教学方法的探索,只是刚刚开始,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对“语文考什么,怎么考”也一直感到困惑,所以迟迟不能动笔,正应了鲁迅先生的话:当我沉默,我感到充实;当我开口,我感到空虚。之所以决定付梓,是因为觉得对语文教育本体论基础的研究非常重要,而我的一孔之见也可以得到方家的分析、指教和批判,以利于语文教育更好地前行。

让语文教育回归本体,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最难做到的,就是做回自己,做回本体,就像我们的“基础教育”很难做到“基础”,我们的“高等教育”也很难做到“高等”,我们的“语文教育”也很难做到“语文”。

最后,以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被广为传颂的名言作结: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斯为序。

目 录

1 选题缘由及框架	1
1.1 选题缘由	1
1.2 研究意义	2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4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其技术路线和实施步骤	8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10
2 语文是什么	11
2.1 “语文”源头的学理欠缺	12
2.2 语文发展中的学理欠缺	15
2.3 语文到底是什么？	18
2.4 结论	24
3 语文教什么	26
3.1 语文不教什么？（上）	28
3.2 语文不教什么？（下）	32
3.3 语文教什么上的其他错误认识	38
3.4 语文教什么？	44
4 语文怎么教	83
4.1 语文教学可教吗？	84
4.2 语文教学需要系统和循序渐进吗？	86
4.3 语文多元教学有界吗？	97
4.4 语文教学活动重“形”还是重“实”？	103
4.5 语文教学如何面对传统？	108

5 百年中国语文教育的哲学基础	116
5.1 实用主义	116
5.2 国家主义	121
5.3 科学化	126
5.4 人文主义	133
 结语 语文教育本体的遮蔽和澄明	146
 参考文献	150
 后 记	154

选题缘由及框架

1.1 选题缘由

语文是什么？

语文教(学)什么？

语文怎么教(学)？

严格地说,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并没有为广大的语文教育工作者或者研究者重视。就我个人而言,尽管在大学四年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有十余年时间一直担任中学语文教师,后来从中学到师范学院从事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教学,培养的也基本上是中小学语文教师,但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认真思考或者直接面对过这样一些问题。

是的,我相信很多研究者尤其是语文教师都没有很好地思考过这样一些曾经不当成问题的问题。语文不就是叶圣陶先生说的“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或者“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吗?语文教学不就是字词句章、语法修辞、阅读写作的教学加人文、思想熏陶吗?但是,我相信许多的语文教师或研究者又同样面临这样的一个困惑:语文越教越不会教,越教越不自信。

于是,语文教学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一直处于被批评、被责难甚至被声讨、被否定的局面。单就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语文教学大讨论最终引发的语文教学大批判来说,参与人数之多,攻击火力之猛,否定程度之深,足以让语文教育颜面失尽,让语文教师斯文扫地。语文教育几乎到了百无一是的地步:语文教育成为了“误尽

天下苍生”的“罪魁祸首”^①，使得语文教育研究圈内外的人都产生了对它的忧思^②，乃至钱梦龙先生要为它“招魂”^③，杨启亮先生发出呼唤“让语文回家”^④。

语文和语文教育何以到了如此“丧魂落魄”的境地？这个问题引发了我的关注和思考。当我们检讨现代语文教育的发展轨迹，甚至探寻前学科时期的语文教育，我们不能不说，百年语文教育历程中有些时段对语文教育本质的偏离甚至造成了语文教育的尴尬和断裂，而这一切都和语文教育本体研究的缺失有关。

因此，我们终于明白，要解决语文教育的问题，首先要解决语文教育的元问题：什么是语文。是的，如果语文教育工作者或者研究者，连“什么是语文”都没有搞清楚，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语文教学。

在探讨语文教育本体的时候，有必要强调现代语文教育的民族性和传统继承问题，因为现代语文教育脱胎于古代语文教育，不可能不受到古代语文教育的影响。比如古代语文教育带有大教育和泛教育的倾向，这一点在现代语文教育中也体现为泛语文的状态；再如古代语文教育特别重视立文和立人的关系，强调作文如做人，同时特别强调为圣贤代言，带有浓厚的教化色彩，而这体现在现代语文教育中特别表现为政治化、思想性和伪圣化；同时古代语文教育特别重视模仿，现代语文教育特别表现为重阅读的倾向，强调通过大量的阅读（精读和泛读）培养学生的语感……

在探讨语文教育本体的时候，同样有必要强调外国语文教育和语言理论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影响。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到现在，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光荣还是挫折，并不纯粹是传统语文的保留、延续和在新情境下的演化，还有西方教育理论、语文教育理论、语言理论的影响。如语法系统的移植，语言形式的变化，甚至文章体裁的分类等等。

在探讨语文教育本体的时候，还有必要强调百年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轨迹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影响。从一开始的启蒙，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党化教育，到我们党的为无产阶级培养接班人，到后来的人文性的回归，无一不在语文教育中有所折射，有时语文教育甚至成为政治教育的翻版或代言人，而这又充分体现出“中国特色”。

1.2 研究意义

关于语文本体的研究，可能引发对语文基本内涵、语文教学内容、语文教学方

① 洪禹平，杨东平。误尽天下苍生是“语文”？《羊城晚报》，1997年3月27日。

② 王丽。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第1版）。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③ 钱梦龙：为语文教学招“魂”。中学语文教学，2004，2。

④ 杨启亮。困惑的语文：一种回归本体的教学期待。语文教学通讯，2005，9。

法、语文教学评价或检测的新一轮探讨,从而使人们对语文基本内涵、语文教学内容、语文教学方法、语文教学评价或检测的探讨更趋于本真。虽然语文和语文教育方面的著作汗牛充栋,关于语文和语文教育方面的相关论文也数不胜数,但在语文教育研究中,却存在着很明显的“三多三少”和“三气”现象,成了语文教育研究的致命伤和“软肋”。所谓“三多三少”就是倪文锦所说的“意气用事的多,充分说理的少;自以为是的多,逻辑论证的少;消极批判的多,有效建构的少,缺乏科研的含金量”^①。很多的语文教师把这些研究者归结为韩非子所说的“五蠹”之一,认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认为他们只会误导语文教育或教学,因为大量的研究文章都是“我主张”“我认为”的个人经验或随感,很难切实帮助或指导语文教育,事实也证明,这样的“理论”和“研究”由于缺乏真正的学理和方法论基础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推进语文教育的发展。所谓“三气”就是指“俗气”、“浮气”、“匠气”。所谓“俗气”,就是没有自己的价值标准,追逐时髦,随波逐流,热衷“解构”和“重构”,张嘴“哈贝马斯”,闭口“海德格尔”,挟“洋”自重,以“新”自捧;所谓“浮气”,就是缺少必要的学术底蕴,也缺少“行以求知”的研究态度,不“上”不“下”,不“中”不“西”,不“古”不“今”,喜欢制造学术泡沫,甚至为吸引眼球而抛弃学术道德;所谓“匠气”,就是缺乏学科素养和教育素养,缺乏学术习惯和学术精神,注重经验和直觉,强调技能和外显,故而长期停留在“匠”的层面^②。不客气地说,他们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误导、污染和遮蔽,使语文和语文教育偏离了本真和本体,成了“伪语文研究”和“伪语文教育研究”。而本研究试图从语文教育本体论的角度来探讨语文教育的逻辑起点,来探讨语文教育的本真和本质,来探讨语文教育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和对语文教育本体的遮蔽,从而从源头回答“语文是什么?”“语文教育是什么?”“语文怎么教和学?”“如何知道我们所进行的语文教育正在实现我们的语文教育目标而不是偏离?”等本质性的问题。

关于语文本体的研究,可能从根本上理清语文教学界长期以来一些纠缠不清的基本问题,如“文”与“言”、“文”与“道”、“文”和“知”、“教”与“学”、“教”与“研”、“形式”与“内容”、“工具性和人文性”、“小语文(学科语文)”和“大语文(生活语文)”等等,改变我国语文教学的前学科或准学科状态。

关于语文本体的研究,至少在理论层面上能够说明白,为什么语文教学百年来一直处于被批评的状态,一直被认为处于低效、无效甚至负效的状态,为什么那么多的作家或大家都认为他们的语文水平并不来自于他们所接受的语文课堂教学,从而使人反思目前语文教学的“非语文”状态,从而真正地“对症下药”。尽管语文

① 倪文锦.语文科课程论基础.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② 金沙.以古典的心态涵养学校精神.教育参考,2004年第6期.“三气”原指学校里存在的问题,笔者做了相关调整.

教育本体论的研究是个高难度的课题,但任何真正研究语文教育的人却不能不从这里出发,否则就会越走越困惑,发出“越研究越糊涂”、“越教越不会教”的慨叹,成为歧路亡羊,最后甚至越来越偏离语文教育,走上不归路,因此“让语文回家”应该是当代中国语文教育的诉求,而只有本体论确立后,原则论和方法论也才有可能确立,这一切都使我们不能回避语文教育本体论的研究。

由于语文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有关语文教育的研究文献为数甚多,但关于语文教育本体论方面的研究则显得相当薄弱。尤其从教育学和社会学的上位角度结合中国语文学科的自身特点和规律来考察中国语文教育,并且从史论结合、实然和应然的视角切入研究语文教育本体的,从本人目前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则几乎是空白,这也使得目前的语文教育不但离“语文学”的路途非常遥远,甚至还不具备一个成熟学科的品格。因此,本研究就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填补空白的意义。

本研究尝试解决的问题是:(1)在对“语文是什么”的理解上,曾出现过怎样的误读和遮蔽?“语文”到底是什么?(2)在对“语文教什么”的理解上,又曾出现过怎样的误读和遮蔽?“语文”到底教什么?(3)在对“语文怎么教”的问题上,还曾出现过怎样的误读和遮蔽,“语文”到底怎么教?(4)百年语文教学的教育哲学依据有哪些?这些教育哲学使语文教学出现过怎样的面目?从本体论视角语文教学出现过怎样的成得失?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本体论视野下的对“语文是什么”“语文教什么”“语文怎么教”以及百年语文教学教育哲学基础的探讨,祛除历史和现实蒙蔽在语文教学上的非本体因素和危害,使语文以及语文教学回归本真或本质,即回归其应有之义,并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 and 变化,从而确立语文科本体论的基础,即尝试回答“语文教育应该回什么样的‘家’(本体)”以及“怎样才能回家”的问题。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中国语文教育研究的文章数量众多,但由于中国语文教育研究学理意识相对薄弱,大多数研究者没有明确的层面意识,即叶圣陶先生所说的,我国的语文教育研究实在“太过幼稚”。叶圣陶先生所言应该非常恰当,中国的语文教育研究其实也的确存在着“大而无当”、“太过琐屑”的情况。因此,也就存在着太多的“正确的废话”。王荣生先生曾经把语文教育研究的归属类型分为七个层面:人——语文活动层面,人——语文学习层面,语文科层面(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层面),语文课程

具体形态层面,语文教材具体形态层面,语文教学具体形态层面,语文教育评价层面^①;同时从性质角度分为五个层面:事实性质的研究,价值性质的研究,规范性质的研究,学派立场的研究和多元视野的研究^②。从上述角度看,语文教育原则层面、语文教材具体形态层面和语文教学具体形态层面的文章或论著较多,事实性质的研究也相当多,但涉及语文教育本体层面的相对较少。即便涉及语文教育本体层面,也往往是教育原理和教育哲学的演绎或西方教育话语的搬用,很难真正达到“形而上”和“学科性”(语文性)的层面,也就很难真正指导语文教育实践。语文教育学理层面的缺失已成为制约语文教育和语文教育研究发展的瓶颈之一。

不过,如果我们关注近20年来的语文教育研究尤其是1997年以后的语文教育研究,还是有一些文章或论著有着或隐或显的从语文教育本体视角探索的痕迹。

早在很多人把语文高考和语文考试作为“一千个伤心的理由”,认为它应该对语文教育的失败或异化负责的时候,钱理群先生就指出,“所要讨论与质疑的,不是考试本身,而是考试所要引导的方向,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往那里去’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要追问考题的背后,所暗含的预设的课程标准、培养目标,而这又必然要追问到根本的教育观念上去。人们对目前语文高考的种种不满……说到底,就是因为在这些‘教育的原点’上出了问题。”^③钱理群还说,“现代教育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它确实需要培养有能力、有效率的专门科学技术人才(包括技术官员),但同时它又存在着使人工具化、奴隶化的陷阱与危险。我们今天高考的弊端所暴露的教育危机,并不在于对知识、能力的训练本身,而是我们走向了科学主义的极端,一方面知识、能力的训练陷入了烦琐哲学,一方面又忽略、排除了作为教育的根本对人的心灵、智慧的开发,对人的性情的陶冶,人格与个性的培育,独立、自由精神的养成,甚至有可能走向窒息与控制受教育者的心灵的反面。”并举出了很多学生在2004年高考作文“战胜脆弱”中为了获得作文高分不约而同编造了“父母双亡”后如何战胜挫折经受考验的例子,来说明语文教育在“育人”本质上的异化^④。钱理群先生的话语,已初步触及了语文教育的“教育本质”。

杨启亮先生关于语文教学发表的系列论文同样引人深思。在《体验语文:一种教学方法论的解释》中,他对种种异化语文教学的现象、行为痛心疾首,强调体验和自然真实对于语文教学的重要:“外在的、间接的、功利性的动机和目的异化了语文教学,并且使体验语文,即使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宽容,也渐渐失落了。失落了体

① 王荣生. 语文科课程论基础(第1版).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第11页.

② 王荣生. 语文科课程论基础(第1版).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第10页.

③ 钱理群. 语文教育门外谈(第1版).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第69页.

④ 钱理群. 语文教育门外谈(第1版).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第70—71页.